

论《诗经》雅颂的天人观

储兆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天人观是中国文化的母题, 渗透到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各个方面。《诗经》雅颂里充满了诗意化的天人思想: 先民们从“天生万物”而萌生了“天生人”的观念, 天被视为有生命的实体(上帝), 它成了最高伦理道德的化身(天道); 因君为天之子, 故天君同道, 君应有德, 顺天保民(王道), 否则君违天道, 王位将倾。这种天君同道思想是基于现实的苦难和先民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这种诗化思维, 对天的神化与对君的控制并存, 其结果是在现实性的虚幻中实现了理想化的满足。

关键词: 诗经; 天; 君; 民; 理想政治

中图分类号: I 2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53-03

On the Idea of the Heaven and Man in *Book of Poetry*

CHU Zhao-we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the Heaven and Man, a motif of Chinese culture, pervades almost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hymns and odes of *Book of Poetry* is imbued with this idea poetically. Deriving from the concept that the Heaven creates everything on earth, our ancestors came up with the thought that fostering human beings, the Heaven is figured as the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life (God), thus embodying the highest moral and ethic norms (namely the heavenly way). Now that the monarchy, as the son of God, engages in the same pursuit as the heaven, he is obliged to comply with the moral norms in the way of conforming t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rotecting his subjects (namely the kingly way). If the monarchy violates the norm, he will be overthrown. Such engagement in the same pursuit is conceptual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istic sufferings and idealistic politics of our ancestors. This poetic idea not only apotheosizes the Heaven but also dominates the monarchy. As a result, the idealism is achieved in the virtual reality.

Key words: *Book of Poetry*; the Heaven; the monarchy; people; political idealism

从上古神话到《诗经》, 我们的先民逐渐由认识自然过渡到认识自身及其所组成的人类社会, 在两者的接壤处, 可以从《诗经》雅颂中管窥到先民们建立在理想政治追求基础上的天人观。

收稿日期: 2010-12-27

作者简介: 储兆文(1965-), 男, 安徽舒城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建筑文化研究。

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指出:“在生命和生活中都存在许多谜,这些谜常常占据着人们的脑力。一旦人们开始思想,他们就试图来解答,并且尽可能和按照他们的知识所允许的限度内解答了他们”^{[1]5}。先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是从人的起源开始的,但是由于知识贫乏所形成的蒙昧和片面性,从而使他们的认识往往披上神秘的光环,有些方面被扭曲、被夸大、被替代,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用某一方面的片面知识去通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或现象,对人的产生的理解便是如此。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草木庄稼的生长取决于天气的冷暖变化,春天草木从土地里长出,随后开花发芽,秋天草木枯黄凋敝;风调雨顺则谷物丰收,旱涝灾害则庄稼减产……因而在上古先民的意识里有了“天生万物”的印象,并将这种印象延伸到“天生人”的领域:“天生丞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丞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这里叙述的“天”像生“物”一样的生“丞民”,与“天”命令“玄鸟”下界生“商”,都肯定人是由天生的。而《诗经·大雅·生民》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是叙述周的祖先后稷的诞生,虽然已过渡到人(姜嫄)生人(后稷)的阶段,但其中仍然潜藏着大地生庄稼的意识积淀:“姜嫄”实际上代表广袤的平原,“嫄”即“源”,而“稷”即为先民们的主要食物“谷子”。因为天与地是紧密相联的,故称天为父,称地为母,《诗经·大雅·巧言》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诗经·周颂·天作》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这里地也成了天的创造物。天、地相联是天人关系藉以建立的基础,因为天与地相反相承,共同负载着人类,人虽由天生,却生活在大地上,天与人是这种“转折亲”关系,并通过这种亲族关系将人与万物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种天生人的观念,并非对人类起源作科学意义的探讨,而是一种认识体系,更是一种伦理观、道德观与政治观的最初显现。这可从《易经·序卦》中得到印证。《易经·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

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2]648}。它是以天地为根,然后为礼义寻找权威的依据,其归宿在礼义——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与政治观的核心。

《诗经》雅、颂的天地生人观念,实质是人在其人格化了的天上,透视自己及所处的社会,来寻求建立一种伦理关系和政治结构。这是对天、人的神化,是迈向理想化的第一步。

天既然能生育万物和人,那么它自身也是有生命的实体,也应和人一样有精神意志,这种精神意志集中体现在《诗经》所谓的“上帝”身上。为了实现对苦难人间的理想化,先民们虚拟出了主宰人间同时又是人的母体的上帝或天帝,“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3]。上帝的意旨实际上是人们神化了的理想。《诗经》雅、颂中的上帝(或天)是以欢乐的赐予者、苦难的拯救者、正义的监护者和道德的评判者的面目出现的。天降丰年时,人们对上帝的赞颂:“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饗,降福无疆”(《诗经·商颂·烈祖》)。征夫不堪徭役之苦时,对上天呼救:“明明上天,临照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朁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诗经·小雅·小明》)。久旱无雨时,君臣百姓祭求于天:“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羸”(《诗经·大雅·云汉》)。

可见,先民心目中的上帝是伟大而威严的,当欢乐和幸福降临时,作诗颂美它;当厄运来临时,又向上帝诉说求援,虽然有时在灾难持续时,发出过责难与疑问,但仍将它看做唯一的救星,未尝对它彻底绝望。

《诗经》雅、颂中天人观的核心是天君同道观。主要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一、天有天心,赐惠万民;君应有德,顺天保民。仁爱慈惠是上天的本性,人君亦应如上天一样,具有“令德”。“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诗经·大雅·假乐》)。而所谓“令德”最终落实在“宜民宜人”上,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和福祿。因此,天君同道就是要求人君不断接受仁慈

上帝的诱导,顺天而治,解救民瘼。二、天命无常,它也制造灾难,倾覆君位。上天“无私载”、“无私覆”,有着恒久执一的品格,但天意并非一承不变,它有着自己取予载覆的法则,其标准是“唯德是辅”,君王若顺天保民,则风调雨顺,拥有王位,否则,上天变其成命,覆其王位,以有德者代之。“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诗经·大雅·荡》)。

这里叙述上帝曾立殷(商)为王,使拥有天下,因袭不已,但商纣王,逆天无德,所以上帝变其成命,倾覆了商朝;周虽是小国,但文王有德,顺乎天意民意,故上帝以周代商,使周拥有天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得罪了上天,即使祷告也找不到对象,无论怎么祷告也没有用”^{[4]95}。君位君权是“天授”,更是“民授”。“民授”就是“一个人有较高的修养,人民群众拥戴他做国君”^{[4]126}。

这种凶吉祸福、邦国兴废系于天命的观念,虽是宿命的,但它是先民们在苦难进代对明君圣主的向往,因为有德之君,能相对地使天下太平,生民可稍事安宁;而暴虐之君,则会带来天下大乱,生民涂炭。无论是上帝“唯德是辅”,还是“天命无常”都反映了先民对王道乐土的理想追求,它采用曲折的形式集中到上帝的公正无私上。

天君同道是先民寻找到的化理想为现实的途径,然而,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的途径,其思路如下:

基于现实的苦难,人们主观精神产生了改变它的欲望(人道);而要改变现实,对于重压下的

初民来说,只有藉天之威,故虚拟出一个公正无私的上帝,它有着自己的法则(天道);又因为先民们生活的幸与不幸,很大程度取决于君的贤与不贤,要实现“乐土”的理想,必须让人君顺天养民(王道),惟有如此,原本苦难的现实才能变成理想的现实。它以现实为起点,其归宿仍是现实,其中对天的神化是关键,天人交感是基础,而其归宿在于对现实的理想化^[2]。这种理想化的人间乐土,在《诗经》雅、颂里有大量反映。如:“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诗经·小雅·北山》)。

其实,先民们的这种理想,是建立在玄想基础上的,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一枚不可能真正实现无果花。然而,这种追求是执著的,深植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之中,在一有现实可能或超出人的承受阈限时,常常变成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的内驱力。

《诗经》雅、颂里的天人观,尤其是天君同道观,一方面固然是对君王的神圣化、合法化,是无奈愚昧的表现;一方面也是对君王的约束与威慑。因为国君虽为上天所立,是天子,有生杀予夺的统治权,但是,“天无私覆”,“惟德是辅”,因而,国君必须以民为本,以德为本,这在无形中为国君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利民措施。]所以说,《诗经》雅颂里所反映的天人思想,实质是先民藉至高无上的天威,来实现对人间王道乐土的理想政治的追求,尽管其赖以实现的基础是那么的虚幻与脆弱。

参 考 文 献

[1](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M].王子野,译.北京:三联书店 1963.

[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